

耕读教育的家国情怀

——探寻义乌四大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传承

科举取士,是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选拔官员的主渠道,也是义乌历代举子终生追逐的梦想。在唐天宝三年(744年),楼颖以国子生登进士第,成为义乌历史上第一个进士,至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宣布废罢科举考试的1300多年时间内,义乌历代登进士共203人(其中文科进士179人、武科进士24人)。其中在宋朝,义乌还出了一个状元王龙泽、一个榜眼朱质。

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。历来考试都是普通人改变自身和家族命运、实现阶层跃迁的重要途径。宋室南渡后,大量北方士族涌入义乌,带来了北方中原地区先进文化,也推动了义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,使义乌应试科举的人数剧增,录取率迅速提高。在宋朝,义乌有132人登进士,让众多历经了寒窗苦读后的学子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,而从义乌古代“官村”的形成、从义乌四大传统村落的人才聚集现象和效应分析,则在明清时期表现得最为凸显。明朝对恢复科举制定有一套成型的法规,“科举之外无出路,科举之外无人才”,即使出身贫寒,只要在科举中能考中,就可以走上仕途,实现阶级跨越。于是,全国上下的读书人都以科举为最佳出路,像虞守愚、吴百朋等都是从此走上神圣殿堂的。

探究一个村庄为何能走出如此众多的能人志士?除了当地的地理环境因素,良好文化基因的传承,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有着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。所谓的耕读传家,就是一边勤劳耕作,一边勤奋向学,如在当今义乌许多宗祠的门楼上,都刻有“耕读传家”四个大字,先贤们既以此律己,也是对子孙后代的一种警醒与激励。

古人云:“事稼穡,丰五谷,养家口,立性命,乃以为‘耕’;知诗书,达礼义,立高德,养身性,乃以为‘读’。”耕读传家,既是一个家族的价值观念,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人生追求,它将教会全家族子孙如何做入、如何谋生。这是家族传承之基石。

良好家风丰润滋养

一个宗族之所以成为宗族,是因为这个宗族有其共同尊奉的祖先,有其共有的文化认同,比如家风、家训、家规、族规等。好家风,即一个家庭和家族在世代传承中形成的一种良好道德操守、处世原则、为人之道、精神风貌和行为风尚等,它有着鲜明的家族特征。

好家风的形成,需要一代或几代人的共同努力。宗族内一些德高望重的长者,主动承担了行为规范兼教习礼俗的职责,在教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,并潜移默化地对他的宗族成员进行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。当然,这种宗族教育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,比如通过纂修宗谱、建立家规、组织族训来教育宗族成员,或在族谱中选取楷模进行示范,使宗族成员明确自身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。

“夫家有谱、州有志、国有史,其义一也”。家谱记录了一个家族的人口、世系、血统、迁徙、事迹等重要信息,包括许多教育史资料,如祖训家规、劝学措施、教育方法等内容,而在家谱中所记录的诸多治家教子名言警句,则是族人的治家良策,也是激励族人提升人格、修炼品德、立志成事的生动教材。在大元吴氏裔孙发族后,形成了大元、椒山等六个支系,其中在《椒山吴氏宗谱》中写有这样的家训警示:“耕读二字,人家不可缺。古云:‘有田不耕仓廩虚,有书不教子孙愚;仓廩虚兮岁月乏,子孙愚兮礼仪疏。’以此言之,是耕读二字,其可缺乎然,父母固当知所以教,而弟子尤当知所以学。苟或教而不严,学而不勤,徒有虚名,则亦无益于事矣。”

良好的家风家训,为人才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,这是对后代的一种鞭策,也承载了祖辈对后代的希望。金涓隐居于蜀墅塘边的青村后,吟咏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。在《义乌吴氏宗谱》中就载有这样的家训:“凡子弟须当训诲,毋容放荡。如资质可进者,延名师教以经业,熏陶涵养,以期成材。其有家贫不堪者,亲房量力资补,或不通经业,因材施教。”“凡子弟士农工商,各勤其业。毋得嗜酒贪淫博奕好闲,废时失事,老大无成。父兄时加戒谕,如违族尊警治。”

增强一个家族凝聚力的途径有多种,其中编修家谱是增强家族凝聚力的重要手段。以朝议大夫致仕的虞复,“以病告谢,休



义乌古代书院唯一遗迹——杜门书院。

老东岩。桑榆已晚,虑夫家牒废,则昭穆且素,亲疏或规”,在晚年开始纂修《华溪虞氏宗谱》,并请著名爱国诗人陆游作序。虞复道出了本次修宗谱的意义:“上以原其所自出,下将俾后人知本于一,敦宗族而崇礼义也”。待宗谱修成后,在宋开庆元年(1259年)春二月,虞复在《华溪虞氏宗谱序》中这样写道:“凡吾族之子孙孙,当率礼由义,以厚同气。盖礼义兴,则宗族睦;宗族睦,则虽是祖免以至于亲,竭将继续绳绳。虽百世而后,亦秩然伦理之正,权然恩义之笃矣。”

明隆庆二年(1568年),南京刑部右侍郎虞守愚致仕返乡。虽已至耄耋之年,但他“尚攻读孜孜不倦,非六经礼义之语不言”,以此言传身教,教诲子孙以忠厚方正之道,并警示子孙:“做人切勿攀附权贵,不然,有冰山倾颓之危”。他在《重修华溪虞氏宗谱序》中写道:“等而上之,则尊尊之义乃隆;顺而下之,则亲亲之仁笃;旁而及之,则睦友子爱之恩洽生焉。耽疏萃涣,死焉追远反始,其立人纪以渴人道者,岂能外乎此哉。况天理民彝,万古不磨,礼教既兴,则善行日积,不惟远祸,且福至矣,尚何家不永保乎。”

从义乌不少家族的家谱里都可以看到,其中所载的家规家训大多以“勤”字为本,教导子孙后代要以“勤”立业、勉力持家。纵观义乌四大传统村落千百年来人人才辈出、冠裳不绝的背后,都不外乎重教修德、家风正。他们的好家风,无一例外都是注重对家人子女道德素养、文化教养、处事能力与家国情怀的培养。

好家风的孕育,首重立身与处世。在清初的治河名臣朱之锡看来,无论是做人,还是读书治学,都要做到“不冒、不弃、不讳”。他在《国朝官保梅麓公溪西谱序》中写道:“吾婺素称小邹鲁,宗法特严,不使之杂出……禀先民之直道是循,而不致一本素遗,以信吾婺都宗法之严焉已尔。如曰显宗也而冒之,弱宗也而弃之,继宗也而讳之,是自诬兼以诬人也。”这也正是读书治学的精髓。

常言道:“富不过三代。”但文化却可以传承千年,只有家规家训才是可以传之百世的真正财富。北宋大儒张载的“横渠四句”一直被人们传颂不衰: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。”一心为国为天下、忧国忧民的古人,他们的心里装着黎民苍生,这样的贤者,在义乌的历史长河中并不鲜见。

对于义乌传统风俗和文化的传承,虞国镇在《崇祯义乌县志》序中写道:“允笃果贞、急公赴义、乐于于善,复为他郡望焉。”“盖为政者,齐民必以义,道民必以礼。欲义先惠,欲礼先立。既立既惠,政事用备,小大有章,乃绩可纪。考往训今,式昭民度。若乃董董簿书者,岂暇游神于言文行远哉?”义乌文化传统之根深蒂固由此可见一斑。

优秀褒奖助学成风

义乌自古崇礼重义,“英贤之盛,代不胜数,皆能质有文武,彪炳一时”。好家风就如沃土,可以让生命得到滋养,育得枝繁叶茂。但“耕读”教育又是一个系统工程,需要每一位家庭成员的付出和配合,要制定族规家训,举宗族之力,才能把“耕”与“读”的

传统文化得以赓续,让先祖遗风得以传承。

古代的大家族都置办有族田,家族的绝大多数人,平时是一边种地一边读书。因家族的后辈队伍比较庞大,假如在这支庞大的队伍中出了一个擅长读书的人,那这个家族就会全力来培养他,让他好好学习,或走上仕途做官,或在某些领域取得成就。待他有了成就,反过来又可以庇护家族。于是这个家族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,可以源源不断地为社会培养出优秀人才。旧时的义乌,优学褒奖,助学成风。

华溪虞氏“家范”规定:“子弟自八岁入小学,十二岁出就外傅,十六岁入大学,聘明师训导,必以孝忠信为主,期底于道。若年至二十,学业无就者,令习治家理财,向学有进者不拘。”为此,在虞氏宗族内还实施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资助、鼓励、奖掖后学仕进的措施,如在宗族公常祀产中单列有“贤田”一项,用于奖励进士及中科第者。

同时,虞氏宗族还通过修建或改善多种教育设施来支持教育,利用集会和祭祀活动进行教育,资助外出求学的族人兴学重学。据虞棠撰的《乐寿堂创立贤产记》中所记:乐寿堂自乐寿翁创始,子孙多历宦途,或以武科捷,或以选拔膺,门闾光大。至道光时,族中为丕振家声,议定由各公常出资助田,置立贤产,凡嗣有文武入泮者,皆予以奖赏鼓励,贤产岁租还供延聘老师或奖赏之类资用。

为方便族子弟参加金华郡城府院的岁考,在清乾隆五十年(1785年),虞氏由公常出资在金华城内建造了试寓,名“华溪别墅”。清嘉庆二年(1797年),族中虞邦瀚出资买下华溪别墅,在重建后进一步扩大了规模。别墅平时供租赁,逢岁考时则免费提供给族中子弟备考居住。其中还专门制定了《华溪别墅条规》,指出:“建造是寓原为与考各人清静读书起见,亦以同宗萃处,明一家敦睦之谊。凡在寓者,均宜长幼秩如,互相砥砺,以图上进,以振家声,凛之慎之。”

不仅如此,华溪虞氏还置以田产,捐给府县书院,鼓励向学。据《丽正绣湖两书院收支征信录》记载:“邑之十都普济寺地方,有郡城崇正书院田一百五十亩,计租六十石,地与山场三百亩,庄屋二所,系前明邑绅虞参政(即虞德辉)所捐,载金华府县各志。”华溪虞氏捐给“丽正书院”的学产,后均分成两份分给了绣湖、丽正两所书院。学产主要用于贫困生赈给之用,以及补贴书院开支等。

“书卷多情似故人,晨昏忧乐每相亲。”如果说成德养性是家风的核心,那么读书明理就是立身的关键。古人寒窗苦读数十载,只为考取功名,求得一官半职。但是,古代科举制度的录取率相当低,一个地方几十年直至上百年能出一位历史名人已是全村的荣耀。但在义乌的这些村落,在长达数百年的漫长岁月里能走出这么多的历史名人,积淀了深厚独特的文化底蕴,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度重视教育。宗族对耕读教育的重视,极大地促进了各地人才的普遍兴起,也为我们当今的教育事业提供了借鉴经验。

开设书院崇文重教

读书,是一个人实现梦想的开始。义乌历史上的许多地方官员非常重视教育,他们崇学校、养人才、誉乡贤。在义乌民间尤其重视教育,人可以穷,可以寒酸,但是不能吝啬教育,为此在家族内还多以为族产专置贤田,资助子弟就学。而士风尤其重视名节,出仕则为国尽忠,刚毅勇为;居



华溪竺阳洞的岩壁上还留有虞国奇题写的“漱石枕流”四个大字

乡则怀民吾同胞之念,造福桑梓;为学则文以载道,以世致用。正是社会各界对教育的重视,这种对教育刻进骨子里的认知,极大地促进了义乌地方人才的普遍兴起,在历史上培养了大量博学之士与杰出人才。

古人又去哪儿上学?古时的义乌主要通过五种办学方式(即学塾、县学、书院、社学和学堂)兴办教育,培养人才。县学亦名儒学,是培养生员进取功名的官办县级学校,以传播儒家思想为主,主要为科举服务。县学的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学田地租,清初名臣朱之锡曾助学田十亩。在《崇祯义乌县志》中写道:“夫国于天地,必首建学校,以为是贤士之关而教化之所从出也。故闻钟鼓者,兴岂弟(同‘恺悌’)作人之思;咏在泮者,起从公于迈之想。”

义乌古代之书院(又称精舍、书舍等)是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,它萌芽于唐,兴盛于宋,对古代文化教育、人才培养及学术思想的形成和传播产生过重大影响。两宋时期,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全面进步,义乌的教育进入了繁荣期,书院建设蔚然成风,讲学与求学之风盛行,社会文化面貌一新。如在南宋,义乌就建有东岩书舍、滴珠书院、讲岩书院、石门书院等。

书院教育与县学教育并行不悖,且书院教育尤其显得活跃,也极为灵活,可谓群贤毕至、少长咸集。到了明清时期,书院教育得到全面普及,甚至盛极一时,其中在明代有杜门书院、釜山书院、齐山精舍、钟山书院、纯吾书院、葛仙书院、石楼书院、绣湖书院等,清代有紫阳书院、漱芳书院、延陵书院、伯寅书院等。这些分散在义乌各地的书院,不仅促进了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,更为奉行“耕读传家”的义乌子弟跨越阶层、跻身庙堂实力助推,培养了许多义乌历史上重要的名士。

书院大多选址于远离城镇、环境幽静之处。华溪虞氏子孙登“龙门”者众多,在他们功成名就后,就想到回馈家乡,在村里办起了私塾蒙馆、书院社学等。为便于子孙潜心研读,族中先贤在华溪周边开发了竺阳洞(即祝公岩)等,建起了书院、书舍供子弟上学。如今在竺阳洞的洞口岩壁上,还留有明万历年间由义乌知县周士英题写的“云山石室”、竺阳洞主虞国奇(官授明直文华府中书舍人)所书的“漱石枕流”等,在洞口则立有周士英题写的《竺阳洞记》,虞德辉(明隆庆辛未科进士、云南参政)题写的《祝公岩记》等古碑。周士英在《竺阳洞记》的最后写道:“夫虞君方退隐东郭,缅怀林数,而从孙司仪子又莘止艮朋,讲业聚乐其中。昔人所称丘壑夔龙,衣冠巢许者,盖谓是乎。”而周士英在文中所指的“虞君”“从孙司仪”便是“参政虞君,名德辉”“从孙司仪,名国奇。”

南宋宝庆年间,虞复因上表进“爱养根本之说”,有忤权臣史嵩之意,“有旨降都郎官……奉祠归隐,居东岩十又五年”。在县东三十五里华溪滴水岩下建起了滴珠书院,教授学生熟读“四书”“五经”,对此在光绪《华溪虞氏宗谱》的古迹部分中有记:“院在滴水岩下,四时流注,不绝听之,若鼓其间。有东岩书屋,又名滴珠书院。先吏部远翁公复,致仕归卧廿年,著书于此。”书院与清流相傍,山与水相依,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,也正体现了中国传统文文化“天人合一”之境域。

华溪除了虞复所建的滴珠书院,还有虞守随的钟山书院、虞守愚的东崖书舍、虞怀忠的纯吾书院等。钟山书院地处县东三十里华溪鲍寺,隐于山坳。虞守随因父亲亡故,建房于其父墓侧守孝。墓处之庐即为钟山书院,“因丁父忧,而庐于墓,弟子远至,环墓而处,诲训谆切,不异诸生。”

明隆庆五年(1571年)虞怀忠中进士,历官江西监察御史,因正直严明,不惧权贵,后得罪宰相张居正而解官。虞怀忠归里数年,无意仕途,于是在华溪郑山头创建了“纯吾书院”,讲经授徒。在光绪《华溪虞氏宗谱》的古迹部分有记:“址在族北三里许案一头。先侍御怀忠公创建,今院规已废……其坊表尚依然耸立。匾刻‘纯吾书院’四大字,旁列‘万历辛巳(1581年)十月 江西道监察御史虞怀忠立’细字。坊背又有‘双槐’两大字,旁细字如

前。湖建院岁时至今嘉庆癸酉(1813年),历年二百二十有三。”

在义乌善出名士学人的村落,往往社会教化的功能发挥得特别好。明洪武己卯年(1399年),陇头朱村举人朱肇致仕归里后,就创办了梅陇书院。朱之锡在《明故礼部儒士化字丁公行状》一文中,也提到了自己在陇头朱读书时的“虬吟山房”。“岁戊寅,余与丁君天申同篝灯于虬吟山房”。

在如今陇头朱村“敦厚堂”门前,悬挂有“儒林师范”的匾额,这是万历皇帝对梅陇子孙朱时雍的封诰:“学古有获,敦行在躬,历典师儒,功成模范”。从朱时雍,经朱懋芳和朱懋芳,到朱宅丰,他们都在“敦厚堂”开设书院。其中,在朱宅丰门下就读的有两人荣登进士,多人中举人。

灵活办学传道授业



私塾又称学塾,千百年来绵延不断。其课堂大多设在自家厅堂或借用、租用他人房屋或寺庙、祠堂等公共场所,在数量上比官学、书院多,分布广。办学形式灵活、简便,按其设置可分为家塾、族塾、村塾、学馆、义塾(义学)等。

义乌私塾发端早,数量多,举不胜举。自南宋及明清时期,义乌各地都有一些书香世家,住住相传几代不衰。明崇祯年间,华溪里人虞奕艺隐居武岩,课子授徒,学者从之。清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,虞氏上房创办“武岩学堂”(私塾),设址旧厅。同年,虞氏中房创办“华水学堂”(私塾),设址五世祠。

古代的先生是先教学生做人的道理,让学生从小胸怀大志——实现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政治理想,再就是考取功名,光宗耀祖。这种思想看似带有封建腐朽观念,实则反映出古人在学生时代就已胸怀大志。

倪仁吉是一位诗人、画家、刺绣大师,名列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,给后人留下了300多首诗歌。她在17岁时从浦江通化(今兰溪市倪大村)嫁给了吴百朋的曾孙吴之艺,在她20岁时丈夫不幸病逝,婚后尚无子嗣。吴之艺的三个兄长分别把各自的次子吴云将、吴云亭和吴云津过继给了她。为此,倪仁吉在吴家的仰止堂办起家庭书塾,亲自授课,教孩子们读书识字,学琴画画。讲课时,她因材施教,常引用吴百朋的平寇事例,让孩子们敬畏祖上,学习祖上的非凡气节。据清嘉庆《义乌县志》记载:“抚教为后,三子云将(康熙十四年岁贡,候选训导)、云亭皆食饷,云津津高龔序”。誉满乡梓。倪仁吉课子有方,深得吴家上下的信任。

古时的义乌,还有一些学有所成但仕途坎坷的士人,如知名学者和诗人金涓等,因为家国观念而不愿意入仕,他们以教授乡间为事业,以文化传承为己任,隐居乡里,聚众授徒,在传道授业、笔耕不辍中绽放自我,留名青史。

义乌素有“文化之乡”和“小邹鲁”的美称,自古重视文教,各种形式多样的教学场所,一切的一切都附着上了思想的灵魂,不但“写在石头上”,也写在历史的卷轴中,写在人们的心坎里。

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/图



写有“耕读传家”的墙体